

# 论 魏 延

徐 日 辉

魏延(?——公元234年),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固县一带)人。在群雄荟萃的三国时期,魏延堪称一流上将,远在郭淮、张郃之上;就偏居一隅的蜀汉而言,算得上超群绝伦。但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这位半人半神的先知,给魏延勾画了一幅“后脑长反骨”的隐患形象<sup>①</sup>。近年新版的《辞海》集学术界之观点,称“诸葛亮死,他(延)与长史杨仪争权,率兵击仪,兵败被杀。”<sup>②</sup>两说性同词异,并无本质区别。我认为:魏延既没有长“反骨”,也没有反叛行径;说他与杨仪争权兵败被杀,未免有所偏颇。魏、杨内讧事件,系杨仪一手造成,在这场历史悲剧中,魏延是无辜的牺牲者。

## (一)

魏延一生活动于军旅之中,功绩显赫在入蜀以后。刘备知人善任,拔他独当一面镇守汉中,成就了魏延平生最光辉的一页。

公元219年,刘备从法正计谋,乘曹操南征,夏侯渊、张郃留守汉中之际,率军一举攻克汉中,从此全蜀归刘。同年秋,刘备被部下推举为汉中王。刘备称王后决定迁治成都,作长久打算。在行将迁徙之际,甚忧何人驻守汉中。汉中又称汉川,是蜀国的门户,与成都形同唇齿。“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sup>③</sup>,是联系荆州、巴蜀、陇右、关中的交通枢纽。而且汉中盆地土壤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以“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sup>④</sup>“略侔三蜀”<sup>⑤</sup>。据有汉中,“上可以倾复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领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sup>⑥</sup>,当年刘邦东出关中就是依靠汉中“足食足兵”。因此,汉中得失事关全局,系之存亡。而当时刘氏集团初入蜀中,立足未稳,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曹魏的攻击,故“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在具体人选上,刘备经过周密思考力排众议,决定起用仅居牙门将军的魏延镇守汉中。令出,“一军尽惊”<sup>⑦</sup>。刘备度全军而独拔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英明果断,具有战略眼光。他以布衣据三分天下,成功的秘诀莫过于知人善任。诚如明代无名氏所言:“昭烈不以属翼德而以属文长,昭烈知文长也”<sup>⑧</sup>。魏延受命,当着刘备及众臣之面,以“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的决心报效蜀汉<sup>⑨</sup>,在场者咸壮其言。魏延的豪言壮语非吹牛大话,“实量己量力之言”<sup>⑩</sup>。他驻守汉中,制定“实兵诸围以御外敌”的方针<sup>⑪</sup>,规划严密,使曹军望而生畏不敢妄入。延熙七年(公元242年)春,当时汉中守将王平以不满

三万兵力，成功地抗御了魏大将军曹爽所率十万大军的进攻，就是“皆承此制”<sup>⑮</sup>。后来姜维统兵，“以为错守诸围”是一种消极的守法，更实守诸围为据守重城，改变魏延成规，结果钟会攻蜀，仅半个月就失去汉中，可见魏延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当时的形势下，魏延镇守住蜀汉的北大门，使关中之敌不敢南攻，保卫了蜀中安全，使新生的刘氏政权得以巩固发展，从“若无汉中则无蜀”<sup>⑯</sup>的观点来看，魏延之功当列前茅。

## (二)

刘备死后，他随诸葛亮多次出征，连战皆捷。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大司马曹真建言数路同时伐蜀。七月，分别由司马懿、张郃、曹真、郭淮率军会聚汉中。诸葛亮派李严率军援救，命魏延西入关中截击郭淮，自己亲率大军迎敌。魏延与吴懿西入关中，大破魏后将军费瑠、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挫败曹军一路主力。关于此次战役的详情，由于陈寿的回护<sup>⑰</sup>，《三国志·郭淮传》只字未提，使今无法知晓。郭淮是曹魏的著名上将，竟败绩于魏延，足证魏延之勇。

魏延不仅勇冠三军，而颇具谋略。上述守汉中之法，可见一斑。初，诸葛亮行将北伐，与众臣商量如何进军。魏延分析关中形势，认为欲占关中，应仿效当年刘邦出汉中时所采纳韩信的“暗渡陈仓”之计，建议分兵合击。一路出子午谷径取长安；一路出褒谷据郿县，如此咸陽以西可定，关中可得，再会师潼关逐鹿中原。当时北出汉中越秦岭入关中有三条军道，即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三道之中以傥骆道最近，为420里；褒斜道次之，470里，此道坦平利于大军行进；子午道最为险远，有660里高山险谷，但魏军在此设防松散，可出其不意直抵长安。魏延建议出褒斜一路应由诸葛亮亲率大军进击，以防不测；出子午谷一路由于道路峻险利在制奇，非胆大艺高之将领不能胜任，他自告奋勇愿出子午奇兵。他向诸葛亮请求“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谷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sup>⑱</sup>，以二十日为限，与大军会师关中。遗憾的是诸葛亮没有采纳魏延的良策。认为此着悬危，不如平出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sup>⑲</sup>，其结果，出陇右除建兴七年（公元229年）略有小胜和八年（230年）魏延败郭淮外，均连连败北。

就整个局势分析，魏延所陈分兵入关之策是完全可行的。当时魏主在洛阳，关中守将是夏侯懋。夏侯懋是魏武帝曹操的贵婿，少时与文帝曹丕亲近。丕称尊后封懋为安西将军、持节、督关中。这位夏侯将军坐镇长安权势炙手，实在是一位“性无武略”，只知“多畜伎妾”<sup>⑳</sup>的庸懦之徒。魏延料定夏侯懋不是他的对手，只要兵出子午谷，夏侯懋必遁无疑。另外，魏延的建议是走子午、褒斜二道，避开魏军防范最严、路途最近的傥骆道，符合兵法“避实就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sup>㉑</sup>的原则，实在无可厚非。诸葛亮持谨慎之理否定了魏延的意见，确属下策。后人为了掩盖诸葛亮的失着，从各方面加以解释，力图挽回他的面子。如宋代洪迈就说：“史臣谓公（亮）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医行窃步，事一旦之濡以规咸陽哉？”<sup>㉒</sup>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竟以天意给来加以粉饰。说：“魏延子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之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

矣，为我咎矣”⑤；又明人王应麟以为魏延是小人，故不用其计。云：“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⑥。他们出自保护诸葛亮为“完人”的野心，得出种种可笑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不足之处，诸葛亮先生既非神仙，岂能无过。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制险以胜方为英雄豪杰。诸葛亮舍危计不用，行平定之策，结果是败北告终。从失败的教训中明白，凭蜀汉一隅小邦，无力与曹魏打消耗战，于是才想起魏延的旧计。公元234年诸葛亮经过三年的准备，决定出褒斜道直下关中。但时过境迁，关中形势已有变化，当时镇守关中的不是怯懦的夏侯渊，而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司马懿采取固守疲敌之法，与蜀军相持。八月，诸葛亮未捷先亡，结束了他一生的北伐。所以陈寿评诸葛亮有管仲、萧何之才，而“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⑦是合乎情理的。

### (三)

诸葛亮刚死，蜀军内部便发生了魏延与杨仪的火并事件。魏延不幸丧身，还蒙上了千百年来的“叛逆”罪名。如果说给魏延昭雪冤案的话，则必须把事情的原委搞清楚。

其一，魏、杨火并起于私忿。导致“有如水火”的结怨，是为人不善互不服的弊故。魏延，本传称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作为上将，蜀军上下皆服其威，但他“性矜高”，人让之以避，养成骄傲之风。唯有杨仪不服魏延，因而延“以为至忿”，视如仇敌。杨仪，本传称他“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魏延长于武略，杨精于干练。平心而论，魏延在蜀中堪称超群绝伦的上将，杨仪只能算作仅次于李严等人的二流角色。而杨仪为人心胸狭窄多与人不和。建兴元年（公元221年）杨仪随刘备征吴，在两军交阵之际，身为尚书的杨仪就与尚书令刘巴大闹矛盾，结果刘备只好将杨仪“左迁涪郡弘农太守”⑧，以齐力对敌。故诸葛亮在考虑接班人时就指出杨仪“性狷狭”难以成大事，不如蒋琬。按理说魏、杨二人当相互取长补短协力为国，事实上却反其道而行之，矛盾日益激化，声达内外。费祎使吴，孙权醉后说：二人不和“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混乱矣”，建议早除二人以绝后患。费祎认为：二人虽不和，但无反叛之心，在大敌当前，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道废舟楫，非长计也。”⑨故费祎充当中人，调之以和。陈寿说：“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⑩。尽管如此，二人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多少有些畏惧，俟亮一旦死去，冲突必然发生，虽有费祎也无济于事。

其二，诸葛亮处理不当，用人有失。魏、杨矛盾风传内外，诸葛亮岂能不知，坐而不管吗？诸葛亮是深恨二人之不平，但出于爱惜杨仪之才和魏延的骁勇而“不忍有所偏废也”⑪，“为作《甘威论》，二子不惑”⑫。这种不力的作法，只能是表面上的改观，骨子里的矛盾却有增无减。其实诸葛亮也有难处，他偏爱杨仪是真，重用魏延是假。试想量杨仪一文儒，在兵战之际敢与能征惯战的上将作对，若无诸葛亮的袒护，决计不能如此猖狂。而魏延呢？对诸葛亮抱有意见。自陈入关策被否定后，一直不服诸葛亮，认为他“胆怯”，深恨己才用之不尽。前评论魏延说亮之语是“亦豪杰不遇知己，愤激之常云耳”⑬。不难想象，一个大才小用的人和一个小才大用的人同在一起共事，还常受其冷语，心里是什么滋味。“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真实地反映出刘备死后用人策略的更变。诸葛亮重用董允、费

裨、马谡、杨仪、蒋琬等二流人物，而不重用魏延、马超、彭象、廖立、李严等一流人才，不能不说气度有所偏窄，在这方面难与刘备比美。刘备能独拔魏延为汉中太守，诸葛亮则无此胆识。非亮不知魏延的才干，他深怕魏延的能力充分发挥后不好管理，故常置于帐前，如教儿童。由于偏爱杨仪和慑于魏延在军中的威信，因此对二人的矛盾只能是听之任之，难作彻底处理。所以当他尸骨未寒就发生了内讧，若诸葛亮地下有灵，亦恐为之痛惜。

总之，我们分析了魏、杨争端的前因，下边再就事件发生的过程及结局，论定谁是谁非？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北伐过程中死亡。阵前失帅是兵家大忌。燃眉之急是商量如何处理后事。是全军撤退，还是由部分人奔丧，大众相持对敌，尚待研究。据陈寿的记载，诸葛亮在弥留之际，曾密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商量后事。决定由杨仪主持退军事宜，命魏延断后。诸葛亮还估计到魏延可能想留守对敌不愿南归，因此特别叮嘱杨仪“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但是杨仪心怀异胎，他“秘不发丧”<sup>③</sup>，派费祎去探听魏延的消息。魏延认为不宜撤退，利在待攻。他直言不讳陈于费祎：“丞相虽亡，吾自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sup>④</sup>？魏延以国事为重，指出不能以一人存亡而兴废天下大事，真是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有胆者，在大事当前甘负重任，与魏争锋；有识者，从蜀军实际出发，并非虚想。这次伐魏，是经过充分的准备，诸葛亮总结以往经验才兵出褒斜。在此之前，他劝农于黄沙，做木牛流马；又实行士兵的“十二更下，在者八万”<sup>⑤</sup>的轮换制度。与此同时他还改革了阵图、战法，又预先运粮至斜谷郾阁，准备与魏长期作战。可以说此战集蜀汉之全力，也是继出祁山以来最大的一次。尽管诸葛亮猝死军营，但对蜀军实力并没有多大影响，即便胜败尚待分晓，总比退举国之兵，使三军辛苦付之东流要好一些。所以说魏延的看法确有道理。在这紧要关头，向为中人的费祎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骗取了魏延的信任，假意与延联名合作，亲手书写“告下诸将”的行留计划。然而他一出延营便驰马反告于杨仪。“仪不可”<sup>⑥</sup>，决定率众南归。魏延见杨仪执意要撤退，无商量的余地，知自己势单力薄难以御敌，被迫提兵南归，计划先杀死杨仪后再率军攻魏，火并由是发生。

关于火并的始末，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成书早于《三国志》的《魏略》云：

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辍行已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辍行军事，惧为所密，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而成书稍后于《三国志》的《华阳国志》则云：

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自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使祎报，仪不可，故欲讨仪。

《魏略》的作者是三国时著名的史学家鱼豢。作为与魏延同时代人所撰写的记录，是可信的。《华阳国志》的作者是晋代史学家常璩。常璩是四川人，他参考《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全国性史书，及八家《蜀本纪》和来敏的《本蜀论》，谯周的《三巴记》等二十余种方志，广采博闻去伪存真，其说至少是重要参考。按照常璩的说法，是“延欲逆击仪，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sup>⑦</sup>，这就给我们提出三说并存的新问题。一是鱼豢的杨仪欲加害魏延；二是陈寿的魏延见杨仪定率大众退却怒而先归，派兵击仪，旨在灭仪后再率军北伐，不幸遭难；三是常璩的魏延怒而先归，欲击仪反遭不幸。那一种说法最接近于事实

呢？我认为鱼豢的载述最具有说服力。其一，魏延若反，不可能舍近求远，而且是在烧毁栈道南归后才宣布；其二，魏延真要反，别说杨仪奈何不得，就当时蜀中所有战将也无一与之匹敌。既然如此，怎么会被杀呢？据《魏略》的记载，我们知道，事情猝发，魏延毫无准备，加上军卒误听谣言，叛延向仪，魏延只好不战军退，才为杨仪遣将所杀。陈寿、常璩记载的矛盾，正好说明早在晋代对此事就有不同的看法。至于裴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三国志》）争审”<sup>③</sup>的观点，是褒汉为正贬魏为闰的议论，难免有所失中。

魏延不曾谋反是死于暗算，史书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杨仪本身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佐证。《三国志·魏延传》云：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资治通鉴》云：

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亮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

仔细考察陈寿的记载，肯定魏延无反意，只是欲杀杨仪等人，并且当时众论多以为是延代亮。但后边两句给魏延的定性留下一个尾巴，所以罗贯中见缝插针，演义出后脑长“反骨”的荒诞故事。而司马光通过辩证，得出“实无反意”的定论，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如果以为魏延伐魏心切诛仪夺权，倒不失一说，但云其反叛则是天大的冤枉。事实上夺权与具有反叛之心者不是魏延，恰恰是杨仪。

杨仪害死魏延之后，是何等的得意。他脚踏着魏延的头颅连连斥之：“庸奴，复能作恶不”<sup>④</sup>？尔后又灭延三族以泄私忿。杨仪如此这般，以为有大功于蜀，理当代亮秉政，岂知诸葛亮早有安排，见其气窄胸狭，将诸事尽托于蒋琬。杨仪回到成都后，只落个“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sup>⑤</sup>的下场。这位自认才能资历都优于蒋琬，却反居其下的杨仪真是有苦难言，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sup>⑥</sup>，甚至将作为调劝人的费祎也遭其“望恨”，发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sup>⑦</sup>的叫喊。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其利欲之迫切，灵魂之丑恶，令人切齿。显然他杀魏延不是出于为国，而是争权夺利以泄私忿和作为升官的资本，若早知此举无用，则势必举兵降魏，换取高爵。费祎密告于主，刘禅徙其汉嘉，后来杨仪又上书诽谤，后主决定下令逮捕，杨仪闻信自杀。杨仪招来自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可佐证魏延“为杨仪所冤”<sup>⑧</sup>的历史事实。费解的是象这样一个小人，诸葛亮竟然爱而不舍，可见识人学问之深，圣贤也难免有所疏漏。

千百年来，人们对魏延的功过是非褒贬曲直，可谓见仁见智。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澄清《三国演义》中被丑化的魏延形象；辩明学术界所称延、仪争权的失察所在；还杨仪奸杀魏延的本来面目。有教益的是从魏延得力于刘备之世，亡败于诸葛亮刚卒的血的事中，实记取如何知人善任共同奋斗的历史鉴戒。

#### 注 释：

①见《三国演义》第105回。

②见1980年版《辞海》缩印本第2035页。

③⑤《华阳国志》。

④《汉书·地理志》。

⑥《三国志·法正传》。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三国志·魏延传》及裴松之

注。

⑯⑰⑱⑲见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演义》卷首(明)无名氏《读三国史答问》。

(下转第18页)

专学生能城能乡、一专多能，以此来为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输送合格的教师。除此之外，还拟采取在普通院校增设师范系、科或增设师专班的办法，来弥补师专培养短缺专业人才的不足。这样，到1995年左右就可以培养输送6万名专业配套、质量比较有保证的师专毕业生到初中任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要为实现这一发展规划积极创造条件。

### 三、关于师专今后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

关于师专在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一历史任务后的去向问题，引起了很多同志，特别是师专的同志的关注。有的师专的同志甚至认为师专的某些长线专业，如中文、数学、化学等现在就应升格为本科。有的同志则认为，对此一问题，应从全省的需要和可能两方面进行论证，根据我省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初中现有教师合格率最低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师短额最大等情况，师专在“七五”、“八五”期间培养初中师资的任务仍是艰巨的。即使某些专业在某个地区可能是长线，但从全省的需要来看，短期内仍不能全面满足要求。因此，这些同志认为在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师专一般不宜升格办成师范学院，更不应转向办成其他专业的学校。当然，从长远来讲，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省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到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师范专科学校发展为师范学院，有的甚至办成综合大学看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即使这样，但师范专科这个层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不会取消的。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小学教育也需要高层次的师资作骨干，甚至整个小学教师都需要具有专科或专科以上水平的人担任。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学教师就是由具有学士学位的人担任的。目前师专应把安于师专，办好师专，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来完成。

最近一段时间，对初级职业技术学校是否应作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有不同看法，国外的作法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同志都认为在初中特别是农村中增设一些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使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必要的。因此，师专在教学的安排上如何适应这一要求，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文作者系中国高教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常务副局长）

（上接第82页）

⑪⑫《三国志·姜维传》。

⑬《三国志·杨洪传》。

⑭《廿二史札记》卷六。

⑮《三国志·诸葛亮传》。

⑯《孙子兵法·计篇》。

⑰《容斋随笔》卷八。

⑱见毛宗岗评《三国演义》卷首。

⑲《困学纪闻》卷十三。

⑳㉑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㉒㉓㉔㉕《三国志·杨仪传》。

㉖㉗《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㉘《三国志·费祎传》。

㉙㉚㉛《华阳国志》卷七。

㉜《资治通鉴》卷七十三。